

同志加兄弟，“欧洲的明灯”

1961年，阿尔巴尼亚生活水平高于中国。北京卫生、交通落后。罗瑞卿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拾柑子的中国人。周恩来说：“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同苏联公开碰撞。巴基斯坦大使与我的一次私下交谈。如何与中国谈判。

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关系中的初期阶段。中国在地拉那首建大使馆。我的第一次北京之行。会见董必武副主席和陈毅外交部长。对（中国）首都人民日常生活的印象。生活水平和防御措施。会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罕见的旱灾及其后果。60年代初期的国际政治气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它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结晶。当时，我在阿尔巴尼亚驻莫斯科公使馆工作，担任一等秘书。根据当时国家关系的惯例，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机构都是公使馆，公使馆馆长是全权大使。大使馆当时是最高级外交机构，通常是大国之间才建立这一级别的机构。但是，实际上，这两种外交机构行使同样的职能。后来，各国在国外逐步广泛地设立大使馆。现在，在国际关系中，公使馆几乎已经不存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同时也引起了驻莫斯科的外交使团的格外关心，被认为是一件非同一般的事件，它不仅对中国人民具有历史性意义，而且对世界的发展，对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以及推动亚洲和其他大洲反对殖民主义的解放运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这一质的变化的重要性，大大超出了中国的范围。

我当时在公使馆担任一等秘书的同时，还担任代办一

职，因为公使除在驻苏联公使馆任职外，还同时兼任驻波兰和驻芬兰的公使，他不得不定期离开莫斯科，去这两个国家履行公务。中国新政府刚一宣告成立，我便接到本国政府的指示，立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递交关于建议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照会。

旧中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人员刚一离开莫斯科前往台湾，新中国的一名参赞就只身来到莫斯科，筹办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事宜。几天之后，其他外交人员和技术人员相继抵达莫斯科。

这位中国参赞在大使馆的客厅里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时，客厅内几乎没有任何摆设。大使馆是原蒋介石的代表机构所在地，它是一座具有中国风格的中型建筑物。我同中国参赞的谈话十分热烈。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同中国人会面。同样，这位中国主人也是头一回会见阿尔巴尼亚人。对于我来说，令人兴奋和惊奇的是，我会见了一位来自伟大国家和人民的代表，这个伟大国家的人民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付出了无数的牺牲，终于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当时我们青年人来说，犹如传奇、神话一般。

当时，我对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非常感兴趣，很想了解一些情况。大使馆参赞便向我作了广泛的介绍。我听到的一切，都很新鲜。他也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向他介绍了我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形势。

我们边谈边品尝中国绿茶，茶水里没有放糖。这是我第一次喝这种茶。中国外交官亲自为我沏茶、斟水，十分

谦逊。由于技术人员和其他使馆人员还没到来，所有的事情均由他一人承担。我们会见时的亲切气氛以及谈话的内容，即刻为我拨开了“神秘的”中国人的迷雾。后来，我又有机会直接亲身了解了中国。

这次会晤没过几天，便得了中国政府对于阿尔巴尼亚建议的积极答复。随后，两国于 1949 年 11 月 23 日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样，阿尔巴尼亚成为同北京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首批国家之一。

随着年代的推移，我国同中国的接触与交往不断增多。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地拉那设立了大使馆。当时，我作为阿尔巴尼亚外交部人民民主国家司司长，前往都拉斯港迎接乘轮船前来上任的中国大使及使馆其他官员。徐以新是自阿尔巴尼亚于 1912 年宣布为自由、独立的国家以来的首任中国大使。我同他及他的伙伴互致友好的问候。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在中国工作人员中，竟有一个人用阿尔巴尼亚语为我翻译他们的讲话，担任我们之间的译员。我之所以感到惊奇，是因为我们两国之间过去从没有文化联系，也没有什么直接接触，中国竟有人能讲阿尔巴尼亚语。中国大使向我解释说，中国同阿尔巴尼亚建交之后，便指派一名干部学习阿语，这个人就是翟世雄，他果然学会了阿文。后来，通过两国间的文化合作，不少中国留学生到地拉那大学学习，还有很多人在北京的专门培训班学习阿语。同样，许多阿尔巴尼亚留学生也到北京大学和其他大学学会了中文。但是，任何一个阿尔巴尼亚留学生的中文水平，都达不到中国留学生的阿文水平。

我们同中国驻地拉那大使馆人员密切合作，为两国关

系的具体化迈出了最初的步伐。直到 1960 年之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是有限的。但是，60 年代以后，尤其是苏联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破裂之后，阿尔巴尼亚——中国的合作出现了新面貌，并扩大到了各个领域。

1961 年春天，我被任命为阿尔巴尼亚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为了对中国的方方面面有一个更广泛的了解，同时也为了应付担任新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我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之后，于这一年的 7 月，我乘飞机前往北京就任，中途经过了布达佩斯和莫斯科。

经过长时间的飞行，飞机进入中国的领空。我紧贴舷窗，格外好奇地俯视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与文化的伟大国家辽阔无垠的土地。我们飞越了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之一——戈壁沙漠的上空。北京越来越近，飞机的飞行高度越来越低，稀稀落落的村庄、矮小的房屋和院落、稀少的森林和不多的绿地，尽收眼底。到处是一片枯黄干燥的土地，房屋大都是用土坯垒成的。给人的印象是，处处是沙漠，村庄则坐落在小片绿地的周围。尽管如此，在“发现”对我来说全然无知的“新世界”而怀有强烈的渴望与好奇心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兴奋与乐观的感觉，因为我知道，我将在中国找到为完成所交付的任务而需要的友好氛围。

1961 年 7 月酷暑的一天，飞机抵达北京机场。停机坪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架中国飞机和一些外国飞机。这表明，当时这个伟大的国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还十分有限。

飞机的舱门刚一打开，一股热浪便扑面而来。这是一

个炎热的夏天，湿度极大，使人喘不过气来。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一切都很简单，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官员们穿着十分朴素，短袖衬衫没有扎在裤子里面。我们在一间迎宾馆坐下来休息。我突然发现，为了取凉，中国官员们把裤子卷到了膝盖，用扇子扇自己的双腿和面部。这种扇子是亚洲人所特有的，用纸和竹子做成的。在中国朋友的关切建议下，我也脱下了外衣，挽起了袖子，解下了系在脖子上的领带，在友好的气氛中，很快便忘记了炎热。

在从机场前往北京市内的途中，我在公路右边看到一条用中文写成的大型横幅。我问上面写的是什麼，译员告诉我是“中国——阿尔巴尼亚友好公社”。我大为惊喜。这个公社是向首都供应农富产品的最优秀的公社之一。在我远离祖国万里之遥，刚一踏上中国国土的最初时刻，这一意味深长的事实更加使我增添了欢乐、信心和完成自己使命的责任感。

阿尔巴尼亚使馆位于外国使馆集中的地位，人们称之为“使馆区”。使馆是一座两层的大型建筑，内有 4 个客厅。我们不仅从来没有物尽其用，而且为如何很好地清扫和维护它而发愁。在使馆区，中国当局建造了许多大使馆和官邸以及供使馆外交官和工作人员居住的公寓。那里为使使馆外交官及工作人员安静地工作，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很快便接受了我递交的国书，在那些年代，由于刘少奇主席——他从 1959 年开始接替毛泽东主持国务——的工作十分繁忙，新任大使通常都是向国家副主席递交国书，这是中国当时的做法。后

来，国家主席会见大使也成为了可能。

董必武年事已高，是当时所有中国领导人中的长者。他是一位从事过十分广泛的革命活动的杰出人物。他同毛泽东一样，是 1921 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之一。我们的交谈非常亲切、平和。他的面容体现了中国的传统特征：下颌留着整齐的胡须，嘴角两边各有一缕细须。他在谈话中表现出了崇高的谦虚美德。董必武副主席同我谈起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并说两国有必要更好地相互了解。

后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也接见了。陈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元帅，聪明勇敢的指挥员。上海就是在他的指挥下获得解放的。我同他的谈话也十分真诚。但他属于另外一种性格，十分机敏活跃，豁然大度，充满乐观。他对阿巴尼亚及其所遇到的问题，对国际政治问题，尤其是与亚洲和“社会主义阵营”有关的问题，十分了解。他同我谈了很多，向我介绍了中国人民为取得革命胜利所经过的历程，以及中国当时的形势、种种困难和问题。但他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所谈的一切，使我再次增强了这一信心，即我在中国将会找到十分温馨的氛围，这将有助于我完成扩大阿中关系及密切的合作的使命。后来我又多次有机会同陈毅元帅会晤，就各种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不言而喻，两国在过去的历史条件和旧制度下，未曾有过任何关系，甚至包括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以为中国人对阿尔巴尼亚知之甚少，而事实上，我发现我所会见的所有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各方面的人士，对我的国家的了

解，都超过了我的想象。同时我还发现，他们对扩大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十分感兴趣。尽管这种友好关系刚建立不过几年时间，他们就要求把这一关系提到更高的水平，并在各个领域取得具体发展，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停留在愿望和目标上，而是要尽快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小国。同中国相比，它更是一小国。尽管如此，从同中国人最初的接触开始，我便发现双方都是以平等的态度严肃地对待问题，没有任何以大压小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和我国人民曾一次又一次地被大国欺辱，被迫遭受大国沙文主义的虐待。在中国期间，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无论是知名人士，还是平民百姓，都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国家的人民的伟大，并不取决于人口的众多和幅员的辽阔，而是取决于人民的道德价值、文化、传统及其对人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我在同中国政要、各个机关的官员及驻京外交官进行结识拜会的同时，也利用空闲时间了解北京市的情况、市民生活及市场状况。因为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全中国的经济水平，也可以说是全国总的形势的一面镜子。

通过初步观察，我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1961年，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中国和中国人民经历了长达30年的反对外国侵略者和蒙昧主义政权的斗争，境况凄惨。阿尔巴尼亚也是一贫穷的国家。外国数世纪的统治，造成了阿尔巴尼亚的落后，此后它又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与蹂躏。这一切及其他一些因素，给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生活造成了致命的后果，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低于

欧洲其他国家的水平。然而，阿尔巴尼亚人当时的生活水平仍然比中国人高许多。

北京的街道上无时无刻不挤满了人群。其中大部分是家境不好的无业游民。男女老少的穿着几乎千篇一律：褪了色的旧咔叽布衣裤，颜色基本上都是蓝色或深灰色。

人们丝毫不讲究打扮，更不佩戴奢侈品。

由于缺乏食品，人们的健康状况很差。作为主食的大米、白面以及各种蔬菜的供应量明显不足，肉类和油类则更是普遍匮乏。为了尽量改善供应状况，各城市周围的边边角角，甚至首都的城里，都种上了蔬菜。不少道路的边边沿沿，其中包括我们使馆前的大路旁，在本来种花种草的地方，也都种上了蔬菜。卫生状况也很糟糕。中国当局曾为保护环境和保持清洁卫生做了许多努力，并开展了“不要随地吐痰”和“消灭苍蝇”的运动。但是，由于当时处于特殊困难时期，卫生状况依然落后。由于化肥奇缺，农村和城市，甚至首都城里，普遍掏取和使用人粪尿作为肥料。当大粪车在大使馆门前经过或在北京的主要街道上行驶时，臭气熏天，特别是当司机开车不经心或急刹车时，粪尿大片大片地洒到柏油路上，气味更是臭得令人作呕。

北京的公共交通很少，公共汽车都很破旧。由于当时汽油和柴油奇缺，许多公共汽车以天然气为燃料：汽车顶上放一个充满天然气的大气包，天然气用完后，汽车只好在街上抛锚，乘客不得不下车徒步赶路或换乘其他汽车。那时，我常常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城市的货物运输更是相当原始，不仅缺少汽车和拖拉机，就是畜力车也不多，人

力车则处处可见。在首都的市中心，我常常看到人们，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把绳子拴在装满东西的旧轮车上，用肩膀拉着艰难地前进。他们脖子上的青筋暴胀，累得满头大汗。我还看到一位病人，被人们抬着送往医院或门诊所，原因是缺少救护车和其他急救工具。西药也很缺乏，治疗各种疾病，大多使用传统的民间中药，这种中药具有一定程度的疗效。中药为各种药草，还有蝎子、虎骨等等，用来医治各种伤痛、关节炎等。

北京除了市中心进行了整治和市郊有一些像样的建筑物外，总的还是数世纪以来的境况：狭窄的小巷，用灰墙围起的中国式平房，大多数的墙壁的颜色为深色。北京的“十大建筑”则是之前新建筑物的代表。这“十大建筑”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由全国各省参加，仅用了一年时间建成的，其中有“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和历史博物馆”，“首都工人体育场”等。除市中心外，当时全市的照明不多。居民住宅的窗户基本没有挂窗帘。夜间，室内悬挂的一盏小电灯泡发出暗淡的光，看书、写字都很困难。

居民们做饭时，大多使用小煤球炉。这种煤球炉通常放在平房的屋外，构造十分简单，上面只能放一个小锅或一个水壶。家用电器根本谈不上，可以说完全没有。北京的冬天非常寒冷、干燥，由于缺少煤炭、木柴和取暖用的天然气，居民过冬困难。

妇女们的家务劳动十分繁重。由于生活的艰辛，她们看上去都显得有些疲惫不堪。我不止一次地在北京大街上看到，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由于发育不良而身材矮小，

她们的脚小得就象小孩子的脚，蹒跚前行。人们向我解释说，中国解放前，许多姑娘年纪轻轻时就被迫裹脚，不让双脚长长，以体现妇女之“美”。其实，这是对妇女的歧视。

在广场或在离使馆很近的公园里，每天早晨都能看到一群群青年男女或老年人练中国传统的“体操”。他们以令人吃惊的耐心做着十分缓慢的动作，这对阿尔巴尼亚人的性格来说，是难以想像的。其他一些人则与此完全不同，他们极其灵活地挥舞棍棒，动作充满活力，常常给人一种他们是芭蕾舞团或杂技团演员的印象。

当时正是中国十分注重群众教育的时代，教育人们热爱劳动、富有牺牲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互敬互爱和国际主义精神。各单位的群众每天都要参加会议，就连在外国使馆工作的中国人也不例外。大家每天定点准时参加会议，纪律严明得令人吃惊。在那些年代，我们阿尔巴尼亚人会开得也不少，但中国人都大大超过了我们。这些会议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往往是没完没了、毫无意义的讨论，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

中国人非常朴素，容易知足，具有拾金不昧的美德。在中国很少听到盗窃案，也许是报道的不多。当时，我们使馆有一位工作人员暂时住在“新侨饭店”。由于忍受不了夏天的酷热，他在空余时间便经常去游泳池游泳。有一次，他把钱包忘在了他住的房间内的桌子上。几个小时以后，他返回饭店，发现房间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钱包仍然原封未动地放在原来的地方。还有一次，阿尔巴尼亚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同他妻子一起在附近市场买了满满一网

兜柑子，在返回住所的路上，网兜破了一个洞，里面的柑子每隔 20 多米就掉一个，他们也没有发现。一位中国人发现了这一情况，便跟在他们后面，不声不响地把柑子一个个拾起来，当这两名阿尔巴尼亚人抵还家门口时，那位中国人紧追几步，手里捧着拾起的柑子，送还给他们。这些柑子值多少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普通的中国人的正直行为所表达的深刻含意。也许这位中国人由于生活困难，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尝到过柑子的味道了。像这种场面在其他国家是很难见到的。在其他国家，如发现丢柑子的现象，充其量是向丢柑者示意，或者干脆不屑一顾。

北京经常刮大风，来自戈壁沙漠的狂风卷来浓厚的黄沙。黄沙布满使馆和外交公寓的各个角落，每天都得精心打扫。当时，还没有保护首都不受风沙之害的防护林带。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开始着手种植防护林带。但是，要在几个 5 年之后，这些防护林带才能发挥作用。

困扰中国的长期干旱，已经持续了三四年，无雨少雪，成为当时的一个全国性问题。我记得，中国政府于 1962 年新年之际，为外交使团举行了招待会。午夜前两分钟，周恩来总理和其他几位中国领导人来到大厅。周恩来满面春风，笑容可掬，且不失幽默。他刚进大厅便开始致新年祝酒辞：“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外面开始下雪啦！瑞雪兆丰年！”所有参加者已经在大厅里呆了好几个小时，不知道外面开始下雪，当听到周总理带来的这一喜讯后，高兴地热烈鼓掌。由于多年没有下雪和长期缺雨，农田灌溉用水、居民生活用水的及工业用水、几乎枯竭。周恩来在致辞后，依次走到每张桌子旁，向应邀者祝贺新

年。

那些年代，中国的工作重心集中在两大方面：发展生产和加强国防。两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全国备战，全民皆兵，被认为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报刊、电影、艺术、文学、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注重以备战精神教育人的工作，并采取了具体的防御措施。战斗精神的教育工作也深入到了儿童中，甚至到幼儿园。幼儿园里的绝大部分儿童玩具是用木头或塑料仿造的枪支和其他武器。

我曾有机会参观了北京的地下人防工程，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由隧道组成的地下迷宫。如果不是由一个有实践经验、地图的专家陪同，我们很快就会找不到出口的方向了。中国政府为了防止人民免遭空袭的打击或原子弹武器的袭击，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周密的组织和安排，可以说是一座完整的地下城：有供市民聚集的大厅，有门诊所、商店、仓库、蓄水池、供电所、特殊通讯联络站，以及其他各种服务设施，真是应有尽有。我们参观的地下人防工程属于商业区。一旦发出警报，居民们便撤到地下，疏散到各分属的大厅，同时所有的货物也搬到地下，重新摆列货架上，商业活动照常进行。这种地下人防工程，耗资巨大，但组织得相当完善。

每个人都对这种工程感到惊奇。那是一个许多国家，甚至包括美国在内，都在搞这种工程的时期。“冷战”的心理主导了一切。美国商人甚至通过向特殊的家庭出售个人防原子弹设施、向集体生活的人们出售不断更新的食物和清洁饮水而牟取暴利。

1961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向

我介绍了防御措施问题。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它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34 周年纪念日。罗瑞卿身穿整洁的白色军服，大将军衔，相当潇洒而富有魅力。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向我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所走过的历程。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时，只是一支由一些用原始武器武装起来的志愿者组成的队伍，而 34 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有了一支纪律严明、讲究军事艺术的现代化军队。这支军队拥有现代化的武器筹备：从步枪、大炮到坦克、战斗机和导弹，所有这些武器装备几乎完全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他还向我谈到加强中阿两国军队之间合作的愿望和必要性。

我向他表示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的节日祝贺，随后又对他关于加强阿中两国军队之间的合作的意见表示了赞同。后来确实这样做了：阿中两国军队之间实现了军事代表团的互访，中国向阿尔巴尼亚军队提供了武器装备援助，其中一部分武器装备直至今今天还在使用。

后来，我获悉，罗瑞卿将军，这位天才的军事家，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不少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前面我概括地叙述的中国的困难状况，对于我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中国革命获得胜利刚刚 12 年，时间相当短暂，国际局势又充满紧张，发生了剧烈变化。我们也不能忘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的旧中国时期，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况，仅仅十年功夫就把当时的 7 亿人口从数世纪的贫困及 30 年的战争

后果中完全解脱出来，是不可能的。中国在社会主义政权的最初年代，在社会、教育、文化领域取得了进步，经济领域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保证了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不致于饿死。当然，距满足人民群众的一切需要还相当遥远。历史遗留下来的困难，再加上长年不断的干旱，给农业及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当时，东西方之间的“冷战”也达到了顶峰。“冷战”的后果使国际政治形势更为严重，这也加剧了中国的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 9 个月，便爆发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虽然只进行了三年，但它所造成的后果及整个朝鲜半岛的危机，都持续了许多年。为了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国以严肃的态度参加了朝鲜战争。

同样，台湾危机也列入了当时的议事日程。台湾当局在靠近大陆的许多岛屿上集结了大量兵力，并在武器、飞机和战舰方面得到美国强有力的军事援助。它一次又一次地发出登陆威胁。于是，大陆的高射炮不得不每天向金门及周围的其他岛屿开炮示警。

在中国边界的南部，印度支那战争远在继续。如新闻媒介所报道的，为了支持印度支那这一广泛地区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当时十分紧张。经常发生严重事件。中国方面接连不断地发布严重警告的公报。甚至达到数百次。尽管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断绝了一切具体联系，但是，双方仍然彼此敞开大门，它们不断在华沙进行会晤，这体现了中国的明智，即使在敌对情况下，也留下谈判的公开渠道。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将士

们所总结的经验和早已采取过的策略。他们出于良好的目的，早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时期，就同蒋介石进行过谈判，以便建立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中国政策的灵活性不仅为自己赢得喘息时间创造了可能，而且实际上也找到了有利于本国的相互接近与妥协的共同点。

当时，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很紧张。在日本，存在着要求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和两国间建立友好关系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十年侵华期间所犯下的罪行表示忏悔的要求也在加强。但是，官方还没有认真采取步骤，以便结束这种违背两国利益的非正常状况。

与此同时，中国与苏联的分歧已很尖锐，甚至公开碰撞。莫斯科把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观点，扩大到苏联——中国国家关系之中。苏中关系的大破裂甚至达到发生严重的边界事件的程度。苏联在同中国十分漫长的边界线上，逐渐集结了众多兵力。

遗憾的是，中国同印度之间也存在着由殖民主义列强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经常造成局势紧张，有时甚至很严重，直至发生武器冲突。尽管如此，双方都努力本着良好的意愿，通过谈判的途径消除分歧，恢复传统的中印友谊。

起初，中国同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界问题也是影响两国关系的症结。但是，通过友好谈判，问题被纳入了正确的轨道，从而得到了解决。在这方面，许多因素和相互间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巴基斯坦驻北京大使拉扎将军——后来他被任命为巴基斯坦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同我进行了一次私下交谈。他告诉我，他曾率领他的国家的代表团同中